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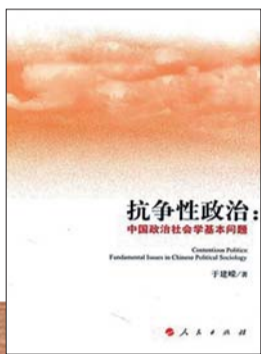
《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：论财富与地位的不平等》  
茅于軾 著  
群言出版社  
本书用鲜活的案例与翔实的经济数据，真实反映当下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与生活现状。



《忐忑的中国人》  
梁晓声 著  
光明日报出版社  
剖析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的忐忑心理，力陈中国社会的根本性问题。



《“气”与抗争政治：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》  
应星 著  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
本书研究了中国乡村农民群体抗争行动的目标、动力和机制所发生的变化。



《抗争性政治：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》  
于建嵘 著  
人民出版社  
本书从社会治理的角度，系统地提出了化解社会冲突的政策性建议。



《弱者的武器》  
斯科特 著，郑广怀等译  
译林出版社  
本书展示了农民反抗外来侵犯的“全貌”。



《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》  
亨廷顿 著，王冠华等译  
上海人民出版社  
本书审视了发展与稳定的关系，是对现有文献有趣而生动的补充。

几年前，著名新闻人白岩松用一本《幸福了吗？》发问：“幸福在哪里？”提起写作此书的初衷时，白岩松如此说：“上一个十年，痛或快乐是大问题；这一个十年，幸福成了大问题。”

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軾今年初推出新作《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》。在这本书中，茅于軾同样关注了社会转型期的民众心理状况。这位已入耄耋之年的经济学家发问：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？

显然，我们很多人的焦虑已经不是一杯“心灵鸡汤”可以解决的。本报记者梳理了相关书籍，寻找导致这种焦虑感的根源与解决之道。

## 我们的焦虑从哪里来——转型期的社会心理变迁

□本报记者 吉祥

中国已经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民众的幸福感理应如统计表里的经济数据那样持续增长

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軾今年推出一本非经济学著作《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》。此时的中国已经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不过，民众的幸福感却并未如统计表里的经济数据那样持续增长。

“叫人丧气的是，社会的怨气特别大，社会的矛盾也特别多。”茅于軾记录了寻常生活里的“怨气”：百姓在互相交谈中，在网上的评论

中，很少有人感到满意，倒是牢骚特别多；马路上吵架的人也多，火气大，动不动就想打架。政府大概也有同样的感觉，很怕社会不稳，把稳定视为压倒一切的目标。一方面大家生活都改善了，另一方面怨气又这么大，到底是什么原因？外国人对此觉得无法解释，我们自己也说不太清楚。无处不在的怨气让步入耄耋之年的经济学家感到困

惑。有媒体披露，茅于軾在写作《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》一书时，他最初定的书名是《中国人的怨气从哪里来》。

很多学者在提到当下中国人的心理状况时，都会与当下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相结合，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和矛盾集中爆发的时期。早在2008年，学者胡纪泽就已开始关注转型期中国人的心理状况，这一

年，他出版了著作《中国人的焦虑：一次文化突围的尝试》。在胡纪泽看来，“焦虑是产生于理性而脱离了理性的轨道的一种情绪障碍”，这位临床心理学家认为，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进程越深入，人们的焦虑越严重。

作家梁晓声也在书中刻画了弥漫在全民心头的焦虑。近两年，梁晓声相继推出《郁闷的中国

人》、《忐忑的中国人》。在《郁闷的中国人》中，刚解决温饱的中国人，面临一系列问题，又开始郁闷了。而在《忐忑的中国人》中，梁晓声提出了一个类似茅于軾的困惑：在国力变得空前强大的二十一世纪初叶，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少，不分农村和城市，不分贫富，不分官民，总而言之，几乎集体陷入了焦虑和忐忑。

“焦虑”、“忐忑”和“迷惘”等成为当下很多人的主要心理状态，并成为一种普遍精神现象

有评论认为，在《忐忑的中国人》中，“焦虑”、“郁闷”、“忐忑”、“迷惘”、“不安”等成为当下中国人的主要心理状况，构成了我们中国人现今的生命冲突、自我分裂和心灵危机，并成为中国人的普遍精神贫困现象。梁晓声在一次访谈中分析了产生这种社会心理的根源，他将此归结为如下三个方面的原因：分配不公、腐败和特权。

基于此，梁晓声呼吁顶层设计改革，并从“中国文化”的深层次缘由中寻找答案。《中国人的焦虑》作者胡纪泽同样是站在大文化观的角度对焦虑进行剖析，他的结论是：焦虑和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，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情理治疗的模式。

中国人的怨气到底从哪里来？《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》一书写道：“比较普遍的说法是贫富

差距造成民怨；民怨的另一个说法是贪污腐化。”不过，在茅于軾看来，这两者均不是中国人怨气的根源。“中国的民怨来自何处？我的直观感觉是社会主义的缺失。正义缺失是什么意思？简单讲，就是不讲理。”茅于軾认为，政府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，政府有许多功能，但是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正义的服务。政府自己要讲理，带头讲理，政府还要帮助别人

讲理，这就是正义的服务。”

学者岑科在《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》的书评文章中归纳道，中国人的焦虑和怨气来自社会不公，即财富或地位的不平等，人与人之间地位的不平等，意味着社会中有特权压迫存在，这会导致严重后果。“中国当前社会中矛盾和怨气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此：社会正义缺失，大家不爱讲理。”岑科说。

茅于軾在书中频繁提及“效率”一词，在公平与效率之间，茅于軾认为可以适当牺牲一点儿公平换取效率。财富的不平等不代表地位的不平等，可以允许一定财富的不平等，并防止凭借权势剥夺他人所创造的财富。岑科在书评文章中进一步指出，未来中国发展除了协调平等和效率的关系，最重要的是消除人与人的地位不平等，实现民主和法治。

如果情绪通过适当的途径得以排解，不仅有利于社会结构的维持，而且有利于促进社会良性运行

有时，愤怒、怨气并非一无是处。

在《郁闷的中国人》中，梁晓声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：愤怒正是推动“顶层设计”的机遇。网络时代为民意的表达提供了一个更为畅通的渠道，梁晓声将此视为政府政策更加顺应民心、民意、民生之举的机会。

社会学家应星《“气”与抗争政治：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》一书中，刻画了乡村政治中气的运行，介绍了“怨气”是如何转化为“怒气”，又是怎样被点燃。在这

本书中，应星建议，政府应逐步形成宽松和理性的问题解决氛围：抗争者以情理法作为自己的诉求原则，政府在化解矛盾时也应遵循这一原则，政府要形成以利益均衡机制为主导的社会矛盾化解新模式。

应星的观点在美国社会学家科塞的著作《社会冲突的功能》中可以找到理论支撑。在这本书中，科塞认为，破除不平等的分配体系的愿望是引发冲突的前提。科塞着重指出，面对稀缺物质资源的分配不均，人们首先在心理上、情感上被唤起，从质疑分配不均、是否合

理迅速发展至否定其存在的合法性；由是人们的相对剥夺感和不公正感日益增强。

科塞提出了非常著名的“安全阀”理论。科塞认为，“安全阀”是一种社会运行的安全机制，敌对的情绪不等于冲突，如果敌对的情绪通过适当的途径得以发泄，就不会导致冲突，像锅炉里过量的蒸汽通过安全阀适时排出而不会发生爆炸一样，不仅有利于社会结构的维持，而且有利于促进社会良性运行，协调发展。这也被视为社会冲突的正功能之一。

在美国著名农民研究专家詹姆斯·斯科特看来，底层群众的怨气更多时候是以相对温和的形式体现。在其著作《弱者的武器》一书中，他说，从历史上看，由于政治成本太高，农民真正的反抗是相当稀少的。《弱者的武器》介绍，农民的反抗体现在日常生活中，他们的武器是偷懒、装糊涂、开小差、诽谤、纵火、怠工等等。这一观点在梁鸿的《出梁庄记》中得到佐证。梁鸿笔下的打工者少有公开反抗，他们一般以上述方式弥补损失，实现他们没有得到的“正义”。

就中国的现实而言，底层民众的政治意识需要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重视。3年前，学者于建嵘曾出版过一部系统论述抗争性政治的学术专著《抗争性政治：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》。

于建嵘在受访时说，当前中国发生的一系列维权活动，其中因利益冲突引发的维权活动，因社会心理失衡发生的社会泄愤事件对社会秩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，“宪法是稳定社会的底线。面对当前的社会冲突，全社会需要的是理智，执政者需要的是智慧”。